

柔美 昂揚 真實

女性意識藝術再現與現實

麵包與玫瑰，是女性解放運動的著名口號。1908年3月8日的美國紐約，逾萬五名女性走上街頭爭取選舉權和縮短工時，這也成為國際婦女節的起源之一。110年過去了，女性的地位得到大幅提高，而近百年的變化更是劇烈和影響深遠。澳門藝術博物館收藏了一批宣傳畫，這批畫系統展現了女性在中國社會地位的變化。然而，現實和當下的諸多現象亦讓人覺得，真正的平等之路仍舊遙遠，廢除文化規限陋習的道路依然漫長。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在最近的社會新聞熱點中，發生在內地江蘇省鹽城市的一則新聞轟動了大江南北。在一場婚宴中，喝醉酒的公公強吻自己的兒媳。有人在現場拍攝了視頻，然後放到網上，引起輿論一片譁然。在引起激烈討論的版塊中，指責公公的人認為這是道德敗壞的表現；覺得小題大做的人則認為，這是別人的事，只要不是太出格即可。

現實習俗仍值得深思

然而，若以女性尊嚴和解放的視角來看，公公這一做法則是對整個家庭倫理和法則的破壞。某種程度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女性主義觀念：一種認為，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從事各種職業和工作，沒有必要將自己限制在家中成為洗衣做飯的家庭主婦；但另一種觀點認為，在家庭中相夫教子、洗衣做飯也是神聖的職責，應當獲得尊重。所謂男主外、女主內，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這兩種不同的女性主義，落腳點均是平等。只不過，一種是積極的、將性別意識模糊化的平等；另一種則是突出了性別差異的平等。然而，無論是哪一種平等，都不能夠容忍一個家庭中的長輩做出出格的事情來。因為在積極化的平等主義者眼中，女性的自由和自主不容侵犯；在強化女性特質的平等主義者看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受侵犯。因此，為這位老人家的行為進行辯護，實在是對近代以來女性解放運動的一種踐踏和嘲弄。

兩種不同女性平等觀

但是，我們不能迴避的一個事實是：正是這兩種不同的平等觀，使得女性在百年來的中國呈現出了不同的樣貌。在澳門藝術博物館的宣傳畫展示中，我們會發現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出現在廣告牌上的女性主要展示的是清純可愛的面龐、苗條四肢和身材。

而廣告牌本身則是從商業廣告到政府宣傳畫多有涵蓋。若回到當時的社會背景看，所謂女性解放，其實是一種身體的解放，性格的解放，外在的解放。這是一種自廢除纏足以來就展開的解放運動。因此，在上世紀複雜的國際格局中，女性宣傳畫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國民國家建設大動員的效果。

正是因為這種效果，曾有學者寫下專著聲稱，那時的上海是摩登的時代。我們無法否認那時的上海流行而摩登，或許是女性解放造就了這種摩登；或許是摩登造就了女性解放。但強調上海摩登的人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個事實：在當時的上海有大量的女性童

工、大量的女性勞動階層、大量的女性居家市民。她們，其實與這樣的摩登毫無關聯。

因此，這樣的女性解放被看作是落後和不合時宜的。這是歷史的事實。因為這種只在乎感官外在、只側重城市生活享樂的女性解放，帶來的是女性成為一種物質化的工具，成為了交際場中被追逐的對象，成為了三流小報的頭條。全民娛樂化的後果，是包括中產階層在內的社會精英對大眾所遭受的苦難視而不見，最終引發底層民眾的反抗。因此，上海摩登的時代也結束在戰火的硝煙中。

1949年之後的宣傳畫，女性的形象塑造出現了新變化。在澳門藝術博物館的作品中，女性的解放開始從外在和形體走向了精神和靈魂。宣傳畫中的女性不再是嬌美動人的形象，而是突出了作為底層民眾的色彩；她們的解放是圍繞自身思想的淨化而推動的。

因此，藝術形象的塑造上出現了體現集體主義風格的群像場景，女性本身也具備了男子氣概。這個時期的女性解放，乃是讀書、寫字、參與生產和建設。女性解放有了進取化的詮釋。

相異價值對撞引弊端

進入改革時代的中國，宣傳畫並不在展出範圍中，但是成長於改革年代的中國人，對性別解放有了新體驗。各種相親節目層出不窮，各種選美比賽競相登場，文藝界的排開層出不窮。從本質上來說，這是兩種不同的女性解放與平等觀念對撞造成的。

當資本可以獲得權力、權力可以獲得資本時，能力和智慧的意義便被邊緣化。人們不再視追求精神理想、學業知識、專業技能的女性為標杆和楷模。相貌和大膽程度，成為了衡量女性的畸形標準。從柔美的上世紀30年代，到昂揚的50年代，再到當下的社會寫實，女性的形象被不斷闡述、不斷解釋、不斷描繪。

然而，真正屬於女性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卻被忽略了。性別議題的研討也是一種階級、階層的探討，只要一個社會中，女性不能夠獲得真正的解放，則社會的風氣和弊端依然會持續下去。從這個角度說，女性解放絕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讓女性物質化的情景招搖過市。文化藝術是宣傳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即使在今天，那些已被視為是與西方右翼民粹不兼容的平等主義、反思主義電影，仍舊佔據了奧斯卡獎不少比重，這或許是對女性解放運動的另一種鼓勵和支持。



左翼話語下的女性成為了自主意志的體現。



宣傳畫上的女性與商業資本主義緊密相連。



20世紀初的中國女性開始了外在的解放。

藝術經典女性意義再挖掘



特寫式宣傳畫。

《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具有鮮明左翼革命色彩的藝術作品，在一段時間內曾被視為「藝術性不足」的作品而一度遭受冷落。但伴隨時間的推移，特別是藝術批評自身的發展，加上女性物質化現象的日趨嚴重，傳統經典的左翼藝術作品中的女性價值和形象，被重新探討和挖掘。例如《紅色娘子軍》中，刀舞的動作其實與中國傳統的武術具有密切關聯，而女性在這作品中展現出的求解放、爭自由的精神，更是彰顯獨立人格特質的典型代表。一些人將歷史主義的藝術審美界定為「回歸歷史」，但歷史或是歷史中的藝術既有「片段的真實」，也有「唯美的真實」。

具體而言，在上世紀的20、30年代，無可否認上海的電影業非常之發達，也造就了胡蝶、阮玲玉等諸多影星，彼時的娛樂繁榮的確是一種片段的真實。但是同樣也無人可以否認，在那個時期，更多的中國女性則是生活在

農村的飢餓、貧窮和舊習慣壓迫中。所以，從晚清開始一直到國民革命，甚至後來的左翼革命，女性解放成為了革命者眼中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藝術經典中的女性解放意義被再發掘，不僅是作品本身的再次躍起，更是人們對時下某種女性物質化現象的反思和批判。

藝術作品是能夠完美呈現性別差異的平台。女性主義是一種來自西方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並沒有局限在批判，而是對性別意識自身的反思。這似乎成了西方社會中的「政治正確」。但也就是在這些年，對西方社會奠基於平等思想基礎上的「政治正確」，人們有了愈來愈多的批評。然而，我們依舊看到，西方的文藝從業者依然在堅守這樣的「政治正確」，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也是歷屆奧斯卡獎頗受人們矚目的原因。這種堅守，是對理想和美好社會的追求，也是「以弱者的立場為弱者辯護」的美德一次次彰顯。

記者手記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和經驗說明，文化是塑造國民人格的重要工具。文化本身並不是抽象和空洞的產物，也不是故紙堆中的說教，文化其實是一種經過時間和歲月積澱形成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文化沒有一成不變的，文化也不會萬世不移，文化是依據時代的變化而產生的動態體系。若以女性的價值和尊嚴為視角，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化中，女性的形象其實並不低下，無論是《詩經》還是神話傳說中的女媧，甚至是東南沿海篤信的媽祖，女性所特有的性別優勢構成了傳統中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不可迴避的現實是，同樣是千百年來，女性在靈魂和精神意義上的敬拜對象，在現實和世俗生活中，卻是作為一種被壓抑性別的實體存在的。以江蘇婚宴中公公強吻兒媳的事件來看，這種婚禮禮鬧習俗並非來自西方，因為西方社會存在非常明顯的代際差別意識；甚至同一個家庭中，人與人的關係也相對獨立。但這種惡習同樣也不是東方古典文化和習俗。古代的中國乃是東亞社會道德高於法律的禮教

不古不洋惡習乃文化毒瘤



傳統中國的女性。



大變革時代的女性和家庭。

社會，這樣的社會中，長輩和君王的地位不僅是世襲和傳統所確立，也是自身作為道德表率意義而形成的。因此，我們無從考究這種不古不洋的習俗從何而來，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習俗是建構文明社會的毒瘤，也是塑造現代公民人格的巨大障礙。

打破這種障礙，不應當以地域、文化作為

藉口。因為從古至今，對女性的尊重和女性主義的發揚已是東西方共同的價值觀。這種共同價值觀的基礎，是女性作為一種獨立個體性別而存在，是家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古不洋的惡習乃是文化毒瘤，因正是這樣的毒瘤，造就了社會中的女性物質化現象，將平庸視為真實、對高雅嗤之以鼻。長久而言，是一個社會的悲劇。

社科院學者訪中大 李培林獻策提振內地消費



李培林主講「消費和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左)與中大校長段崇智(右)交換紀念品。

香港中文大學再度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訪校計劃暨學者講座系列」，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不同領域的學者到訪中大，探討社會學、人口與勞動經濟及語言學領域的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加強兩地的交流，提高學術水準。今年到訪的學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培林教授，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吳要武教授，以及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方梅教授。他們於本週三(21日)舉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講座系列」擔任主講嘉賓，其中第一場演講「消費和中國發展的新階段」由李培林主講。

新發展階段消費不足

李培林分析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段，發展的動力、約束條件及發展方式的深刻變化。他在演講中首先提出，中國經濟增長從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轉變為依靠由內地消費拉動，服務業成為經濟最主要的推動力。但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近年來穩步增加，

但消費總額佔內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從63%下降至59%，低於美國的70%和日本的65%。

李培林於是着手解釋消費比例偏低的原因。「首先，不是因為沒有資金。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快速增長，達到年均16.6%，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同時中國居民的存款，也在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達到16%，同樣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我認為人們不消費的原因，主要在於社會的不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問題。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國成就表現為快速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的問題在於收入差距。需要消費的人沒有太多餘錢用於消費，而有很多錢的人他們的消費趨於飽和。大量的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過低，不利於擴大內需。」

此外，李培林認為對子女教育、住房和醫療缺乏穩定預期，也壓低了當下的消費。「教育、住房和醫療費用這三項，已成為當前中國家庭最主要的消費項目。現在的城市家庭，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預期較



李培林及段崇智與一眾中國社科院及中大學者合影。

高，不少中產家庭為把子女送到外國讀大學，比如到美國讀四年大學，需要積攢100萬元人民幣，他們只能節省眼下的消費項目和數量積攢更多的錢。同樣，住房價格和租金的快速上漲，普通人的購房或租房壓力加大，壓制了當下的消費能力。」他說。

提倡更全面社保制度

最後，李培林提出政策建議，希望長遠

而言可以增強內需，努力保證居民收入增長高於經濟增長，擴大內地中產階級人口，為經濟增長保持動力。「現在教育、住房和醫療費方面的社會保障政策有所不足，需成立更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大眾消費隨着社會保險政策的改進會得以改進。」演講後的答問環節，來自中文大學的師生就老年人消費、地方財政收入等多個問題，與李培林副院長交流，為這場學術盛宴寫下句號。

文、攝：陳添浚